

# 外国文学经典之中国化研究范例

## ——中国大陆近十年弥尔顿三部曲研究述评(2013—2022)

吴玲英, 李未雪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自1832年弥尔顿进入中国至2012年, 中国大陆研究弥尔顿三部曲的论文与著作数目逾百, 而近十年来(2013—2022)相关研究发展更为迅速: 一是研究内容得到纵深性开拓, 特别在弥尔顿多重思想之主题探微、恶魔与英雄之人物探讨、多元文化影响之风格探索等三个维度; 二是研究方法取得开拓式创新, 尤其是跨学科交叉探究方法和跨文化研究路径。通过将弥尔顿研究作为外国文学经典之中国化研究范例展开分析和探讨, 并指出当下研究存在的拓进空间, 希望能为中国大陆未来的弥尔顿三部曲研究指明方向, 或能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论指引。

**关键词:** 约翰·弥尔顿; 弥尔顿三部曲; 外国文学经典之中国化研究; 中国大陆; 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2-0183-11

弥尔顿(John Milton)是英国里程碑式的诗人, 其长诗三部曲——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 1667)和《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 1671)及诗剧《斗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 1671)——是其最后、最重要的创作, 长期受到中国大陆学者瞩目。在西方传教士将他引入中国的1832年<sup>①</sup>至2012年间, 已有逾百篇(部)论文与著作于中国大陆出版, 内容聚焦诗作的早期传播与接受、主题、人物塑造、风格与诗学, 揭发作品的政治性、宗教性与文学渊源。关于这个时段弥尔顿三部曲在中国大陆的研究, 已先后有12篇文献对此进行述评<sup>②</sup>, 本文不再赘述。而近十年来(2013—2022), 中国大陆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研究的缺陷, 且发展迅猛, 成果丰硕: 出版了4部专著及64篇学术论文, 包括6篇国际期刊论文、34篇CSSCI论文、4篇博士及20篇硕士学位论文<sup>③</sup>。这些成果将中国大陆的弥尔

顿三部曲研究整体上推向新的层面、新的境界, 但目前未能得到学界充分关注<sup>④</sup>。由此, 本文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此缺憾, 尤其是通过集中和深入地述评中国大陆近十年成绩斐然的相关研究, 将弥尔顿研究作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之范例, 为其提供一定的方法论指引。

总体而言, 近十年中国大陆研究者更多考察《失乐园》(42篇文献), 而对《复乐园》(3篇文献)、《斗士参孙》(5篇文献)及三部曲整体(18篇文献)的关注相对较少, 这与弥尔顿本人对《复乐园》的偏爱截然相反<sup>⑤</sup>。国内弥尔顿研究者吴玲英如此解释《复乐园》研究在学界的寂寥: “正统教义中耶稣的身份限制了他(弥尔顿)的诗歌艺术想象”, 而且“对耶稣神性的正统认识阻碍了他们(读者)深刻理解和真正欣赏史诗《复乐园》及史诗英雄耶稣”<sup>[1]</sup>。中国大陆近十年弥尔顿三部曲研究在内容上虽呈不均衡态势, 但有纵深

收稿日期: 2023-08-09; 修回日期: 2024-01-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英国16、17世纪史诗与英吉利民族命运共同体想象之研究”(20BWW05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弥尔顿作品整理、翻译与研究”(19ZDA298); 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项目“《失乐园》中夏娃的‘生态自我’之研究”(2021zzts0019)

作者简介: 吴玲英, 女, 湖南慈利人, 文学博士,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英语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与跨文化、西方文论, 联系邮箱: wulingying@126.com; 李未雪, 女, 湖北武汉人,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英国文学

化开拓,并在方法上取得了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路径之突破性创新。可以说,这些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研究尝试,凸显出中国大陆弥尔顿研究的多元化、跨学科、跨文化趋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弥尔顿研究的中国化进程,或给出了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之根本出路命题可资借鉴的参考,包括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比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中国文学理论等。

## 一、研究内容上的纵深化开拓

近十年中国大陆学者主要通过探讨主题、人物塑造、风格三个维度,切中肯綮地阐发弥尔顿的多重思想,揭示纷繁复杂的文学、文化、历史语境对三部曲之形塑,从而纵深化开拓弥尔顿三部曲研究的内容。

### (一) 弥尔顿多重思想之主题探微

弥尔顿集诗人、政治家、教育家、神学家等身份于一身,其晚年创作的三部曲自是其多重思想融汇的结晶。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学者继续拓深三部曲主题研究的内容,采取伦理、文学互文、比较文学等视角,入微地阐释弥尔顿的伦理、诗学、神学、政治、教育等思想。

首先,关于堕落与救赎主题,多数中国大陆学者主要从伦理视角研讨弥尔顿对自由神学、公正意识等关键因素的认识,以及对新教伦理的批判性慎思。王红玫的博士论文<sup>[2]</sup>将《失乐园》置于十七世纪后宗教改革及新教神学语境中,辨析弥尔顿神学思想复杂的根源,通过厘清弥尔顿对改革宗正统的反拨、对异端神学的发展,彰显诗人浓厚的人文关怀,挖掘出其神学思想中“自由”之丰富意蕴,在弥尔顿神学思想的内涵及渊源方面拓展了肖明翰对《失乐园》中人自由意志的研究<sup>[3]</sup>。迥异于王红玫符合神学正统地解释人类堕落是因其自由意志被奴役,陈雷继承田汉等学者<sup>④</sup>对夏娃违禁的辩护,认为上帝对人的设定与其禁令之间存在楔口:上帝既赋予人追求正义的天性,又禁止人获取善恶知识,因此上帝的公正性存疑<sup>[4]</sup>。该论点或许很大程度上受中国大陆学

者无神论立场的影响,虽与弥尔顿“证明天道的公正”(PL 1.26)<sup>⑤</sup>的意图相矛盾,但不无道理,为中国大陆评论者坚守中国立场,对外国文学经典研究中的核心议题进行“中国式把握”提供了范例。而且陈雷的见解与西方部分学者怀疑神正论、支持“幸运的堕落论”<sup>⑥</sup>等观点不谋而合,揭示了中西学者在批判宗教强权方面的共识。鉴于国内学者之前较为忽视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如何侵害其社会原有伦理,陈则恩与吴玲英依据这一转变,恰中要害地涵泳人类堕落相关情节所深植的新教伦理,说明了弥尔顿对资本主义压迫性生产关系与新教伦理中竞争个人主义的潜隐揭批<sup>[5]</sup>。崔梦田综合神学、哲学与政治向度,围绕三部曲中的认知与自由,澄清亚当和夏娃片面的认知方式将其引入歧途的事实,探讨《复乐园》中耶稣示范如何在信仰和德性两方面持守“内在自由”,剖析参孙示例如何争取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sup>[6]</sup>。该研究鞭辟入里地诠释了三部曲中“自由”的多重意蕴,靠拢了诗人思想的精髓之一,即捍卫“宗教自由、家庭或个人自由、公民自由”<sup>[7](349)</sup>,彰显文学实乃一种被召唤、揭示的存在方式,且难能可贵地对照了弥尔顿同时代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观念,厘清了弥尔顿在认知、伦理、信仰等方面的思想。

另一些研究从文学互文视角探析弥尔顿对西方文学传统——包括《圣经》传统和史诗传统中堕落与救赎主题的深化与改写。在深化《圣经》主题方面,李滢波认为诗人通过创造性地生动演绎《圣经·创世记》中人类始祖堕落与忏悔的情节,强调信仰与正义,赋予《失乐园》独特的宗教审美意蕴<sup>[8]</sup>。就改写史诗传统而言,吴玲英等学者洞察弥尔顿重塑传统中的“诗歌吁求”与战争主题、深化救赎主题,揭示诗人对该传统的承继与超越:弥尔顿祈求基督教缪斯而非异教希腊缪斯,这标志诗人将史诗主题的性质从异教转变为基督教<sup>[9]</sup>;弥尔顿摒弃古典史诗的武力战争主题<sup>[10]</sup>,将“战争”改写为人心中的善恶之战,这反映了弥尔顿的夙愿——让“精神通过信仰和慈爱在我们内心工作”<sup>[11](809)</sup>;弥尔顿还将但丁的个人救赎之旅上升至人类再生之期许,这类似中国

近十年来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⑥</sup>的关键理念<sup>[12](82)</sup>——此联想基于中国立场, 蕴含中国学者的独特观照, 有着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这一中国化研究特色。

除上述研究外, 陈敬玺的论著(2022)专章阐述了《失乐园》的神学、政治、教育、性别主题, 较充分地挖掘出相关互文本与历史语境, 沉实解读弥尔顿的观点, 也简略介绍了《复乐园》与《斗士参孙》的主题<sup>[13]</sup>。该研究深度还原三部曲的历史语境: 三部曲诞生于十七世纪——既是英国向现代深入转型的“转折点”<sup>[14](1)</sup>, 亦为地理大发现加速全球化的关键期。目前中国大陆学者较多关联英国内战, 亦指涉英国婚姻法改革、殖民扩张等变革, 但尚待钩沉更多相关史料。

综上, 这些主题方面的研究立足多元批评语境、理论视角与历史场域, 纵深化开拓相关研究内容, 不约而同地揭示了弥尔顿思想内核的特定方面, 包括追寻自由、理性及“内在精神”(the Spirit within)——“信仰、德行、忍耐、节制, 此外还加上爱”(PL 12. 583-584)等等。不过, 三部曲中深奥且异质的思想无疑构成了该研究领域的难点。以弥尔顿的神学思想为例, 诗人在糅合《圣经》、教父学说、改革宗神学、宗教异端等诸多思想资源的基础上<sup>[15](191-195)</sup>, 形成了甚为独特的“弥尔顿式基督教”(Miltonic Christianity)<sup>[16](5)</sup>。然而, 中国大陆研究者多为无神论者, 对神学教义进而对弥尔顿非正统神学观的理解好比“刘郎已恨蓬山远, 更隔蓬山一万重”。值得肯定的是,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学者结合弥尔顿的神学著作钻研了其神学信仰, 但相关核心概念及其思想渊源仍可深入涵泳。需指明的是, 辨明弥尔顿思想的困难出现在跨文化知识生产中, 换言之, 对于中国大陆学者而言, 三部曲所涉英国特定地理区域的“独特且延续的神话、信念、仪式、价值观、语言、法律制度和历史记忆”<sup>[17](143-144)</sup>极为陌生而复杂, 这势必造成他们理解之难, 但也为其借用中国伦理观念以解读弥尔顿的思想提供了契机。

## (二) 恶魔与英雄之人物探讨

就三部曲的人物塑造而言, 中国大陆近十年

的研究主要依据弥尔顿本人的思想, 从文学互文着眼, 仍重点观照恶魔撒旦, 亦关涉弥尔顿式“精神英雄”亚当、夏娃、参孙和《复乐园》中的耶稣。

首先, “弥尔顿塑造最成功的角色”<sup>[18](280)</sup>——撒旦, 因其悖论性与含混性, 近十年继续备受重视。中国大陆学者(如赵蕾)主要通过文学互文视角, 对读弥尔顿的撒旦与其神话原型——奥维德《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的怪物, 揭示撒旦的邪恶本质<sup>[19]</sup>, 与前述吴玲英等学者一样强调弥尔顿鞭挞邪恶、颂扬正义。此类研究拓展并更新了前辈学者肖明翰<sup>[20]</sup>与沈弘<sup>[21]</sup>围绕弥尔顿的撒旦所展开的文学互文研究, 纵深性开拓了此传统研究领域。郝田虎紧密结合中国晚清以来政治历史之曲折进程, 爬梳中国学者批评撒旦之脉络, 界定其中的“鲁迅传统”<sup>[18](282)</sup>, 承袭肖明翰与沈弘等学者对撒旦恶魔本质的界定, 点明弥尔顿的撒旦可为中国当代读者自省的反面教材。该研究的突出贡献在于几近完整地勾勒出中国对弥尔顿的撒旦之接受与批评史, 因而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并紧扣中国历史文化探讨撒旦对于中国的意义, 体现了中国学者“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sup>[22]</sup>的主体意识。

关于亚当、夏娃及参孙, 研究者从互文性视角比较他们与古希腊神话、古英语史诗、《圣经》中的相关形象, 钻研弥尔顿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突破。翟康别出心裁地考察了弥尔顿在描画亚当时对《变形记》进行的反纳西索斯(Anti-Narcissus)改编, 据此批驳认定亚当堕落前不成熟的论断<sup>[23]</sup>, 突破以往评论者仅用纳西索斯神话解读史诗中夏娃的惯例。潘紫霓从女性主义视角比照《创世记 B》<sup>⑦</sup>与《失乐园》中的夏娃, 认为弥尔顿“通过将夏娃塑造为史诗英雄而改写了西方史诗传统中的‘他者’女性形象”<sup>[24](140)</sup>, 由此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弥尔顿赋予夏娃鲜明主体性具有超越传统之意义。这促进了中国大陆学界关注《失乐园》与西方史诗传统之关联。谭茹方在《圣经》原型和现实历史语境的双重坐标中解读了弥尔顿重塑参孙的意义: 参孙较之原型更成熟地对待神意与责任, 这喻示英国民众须经历参孙

般的蜕变,方能推翻长老会和国王代表的偶像崇拜者<sup>[25]</sup>。

对三部曲中英雄的整体探究首现于吴玲英的专著。吴玲英基于对弥尔顿神学著作《论基督教教义》(*De Doctrina Christiana*)的分析,对读诗人指摘史诗传统中的“战争英雄”,阐明了三部曲中诱惑对锤炼英雄的关键作用<sup>[26]</sup>,以及“精神英雄”的本质、特征与三个递进的层次:亚当和夏娃为最初形式的“美德精神英雄伴侣”,耶稣为“精神英雄之原型”,参孙乃“精神英雄之最高典型”。尤值一提的是,吴玲英依据弥尔顿本人的“反三位一体”观(Anti-Trinity)<sup>①</sup>,辨析了中国大陆少有学者关注的问题——耶稣的人性与其神性之复杂关系,指明耶稣示范人性可以擢升至神性,并通过分析史诗设置撒旦诱惑耶稣的十个情节而阐明,神性实乃经受重重诱惑并坚定抵御后达至的人性总和与最高点,由此揭示弥尔顿将耶稣设置为《复乐园》史诗主人公的旨意。该论著作为中国大陆近十年对三部曲中人物塑造较为系统的研究,可给予相关探究一定的借鉴;同时对《论基督教教义》有较为深入的专题分析,可为学者更进一步探查弥尔顿的思想渊源提供重要参考。

概而论之,中国大陆学者在探究三部曲的人物塑造方面,主要在神学、西方文学传统与社会历史语境中阐述了恶魔与英雄的本质、特征和意义;形式上以个案分析为主,整体研究亦有突破;方法上尤其注重文学互文批评,并指出弥尔顿“拼凑、转化和吸收”<sup>[27](35)</sup>大量前人文本,使三部曲为深厚的西方文学传统所浸染,譬如在《失乐园》中,弥尔顿引经据典,涉及“《圣经》、之前文学传统,尤其是史诗传统”<sup>[28](2)</sup>。虽然中国大陆已有不少学者知难而上,追索三部曲中人物塑造对《圣经》、古希腊神话、西方史诗等传统的承继与创新,但三部曲博大精深的底蕴仍有待研究者继续挖掘。

### (三) 多元文化影响之风格探索

中国大陆近十年的三部曲风格研究主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多元文化场域语境中,探究弥尔顿风格的巴洛克特征与宏伟体特点,取得了

重要进展。

刘立辉考虑到弥尔顿在意大利亲身体认过巴洛克(Baroque)艺术,而且该艺术潮流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如日中天,专题研究了《失乐园》的巴洛克特征。虽然已有国外学者探讨了《失乐园》的文体风格与巴洛克艺术的亲缘关系,但刘立辉剖析了之前学者所忽视的史诗主题与巴洛克风格的关系、史诗中人神关系与巴洛克风格之融合,指明弥尔顿运用复杂动态的拉丁化语言和悖论修辞等手段烘托出了一个巴洛克世界,具有“动态性、复数性、碎片性”<sup>[29](129)</sup>;然而此世界中的繁复变动无论如何精彩,都不能胜过理性、公义、知识等美德。此观点与上述三部曲主题研究与人物研究中指明的弥尔顿追寻美德的观点不谋而合。该世界不仅具象化史诗主题:凸显美德之神圣性、“充分展示善和恶两种力量进行较量的壮观性”<sup>[29]</sup>,而且是探索人神合适关系的有效媒介,服务于弥尔顿的“诗人圣职论”(the Poet's consecration),即构建社会正义、守护人生真理、心系人类救赎的诗人使命论<sup>[30](230)</sup>。

易鸣和吴玲英在中国大陆学者中首次关注并参照文艺复兴时期的疑辩传统(casuistical tradition)——此修辞惯例经宗教“怀疑论”思潮的推波助澜而在这一时期被频繁使用,认为《失乐园》中的撒旦式雄辩体现了该传统的辩论范式,所用“句式复杂、措辞高雅”<sup>[31](48)</sup>,并辅以强烈的情感和精湛的肢体表演技巧,极具鼓惑性和感染力,展现了弥尔顿式宏伟体(Miltonic Grand Style)的艺术性。该研究注重在时代氛围中把握弥尔顿风格的庄严,也因此找到了弥尔顿宏伟体的一支文化源流。文章的关键贡献在于突破仅从言语层面分析“雄辩”的做法,创新性地从非言语层面探究其表征,丰富了研究维度。相较于陈敬玺从三个面向探析《失乐园》中弥尔顿式宏伟体的典型特征——想象/类比/典故、韵律/节奏、拉丁化语言<sup>[32]</sup>,易鸣和吴玲英则更注重依据诗人时代的文化语境,抉剔入微地探索弥尔顿式宏伟体的突出特征。

综观上述对三部曲风格的探讨,中国大陆学者主要以《失乐园》为例,殊途同归地试图证明

史诗风格与其主题紧密联系, 服务于弥尔顿一生坚信并践行的“诗人圣职论”。这些从艺术风格角度展开的研究意义非凡, 因为三部曲能成为经典在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是其风格所凝聚的审美特质, 所以更需重视从语言学、诗学和美学等维度分析三部曲的风格。但弥尔顿语言风格的精巧与恢弘无疑使之成为颇有难度的挑战, 这首先根源于弥尔顿特意为其诗作披上了“最丰富多彩的衣装, (内在)却只为最深邃的灵魂和智慧极卓越者所仰望”<sup>[33][19]</sup>; 其次, 由于弥尔顿熟谙十门外语<sup>②</sup>, 致使三部曲的语言深受外语浸染, 甚至连英语母语者亦深觉晦涩。三部曲语言的难度应该可以解释中国大陆为何罕见专题剖析其诗作语言的研究; 在非语言专题的探究中, 虽可见对文本语言的分析, 但仍需拓进并深耕文学传统对三部曲语言风格的影响。

值得肯定的是, 在研究内容方面, 中国大陆研究者在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sup>[34][195]</sup>意识的指引下, 通过纵深化开拓研究内容, 使中西文学文化双向阐发、互通互渗, 从而拓展了弥尔顿研究外延、深化了研究认识程度。需指出的是, 他们的研究不约而同地揭示了弥尔顿的思想精髓与伟大抱负的某些侧面, 包括崇尚个人、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美德精神建构, 以推动其救赎及兴盛等等。

## 二、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性创新

近十年来, 中国大陆学者在弥尔顿三部曲研究中所运用的创新性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跨学科与跨文化两类。需指出的是, 这些方法并非全为近十年的产物, 只是在近十年才更为系统与深入地被应用于中国大陆学者对三部曲的研究实践中。其中, 第一类跨学科研究会通伦理学分析《失乐园》的伦理主题; 联系科学考察弥尔顿与其他思想家或文艺创作者就科学问题展开的对话, 以及弥尔顿对英格兰民族命运的省思; 融合地理学研讨地理叙事的政治与伦理意涵。第二类跨文化研究参较弥尔顿的王权观与儒家相关

思想。

罗诗旻的博士论文或为融会文学与伦理学之跨学科研究典范, 即在外国文学经典研究中指向应用中国文学理论的中国化特色。与前述陈则恩与吴玲英从经济维度切入《失乐园》中的伦理问题不同, 罗诗旻运用中国学者聂珍钊先生多年耕耘后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话, 从宗教、性别、语言及宇宙论诸向度剖析了《失乐园》中的伦理世界, 围绕“伦理秩序”“伦理链条”“伦理选择”等核心文学伦理学批评概念, 揭示了诗歌作为工具性话语进行伦理探讨与实践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理性伦理学所没有的道德实践力量, 同时从中触碰诗人所处时代的伦理脉息, 对深入且系统地澄清诗人的伦理思想有一定贡献<sup>[35]</sup>。此研究的方法论价值在于, 以文本细读为基础, 以社会文化语境深度还原为背景, 恰当运用新的批评术语、理论与方法, 突出中国理论话语, 不单就理论阐释文本, 还揭橥了文本对理论应用的独特工具性价值。该文通过借用中国学者所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 彰显了中国学者对外国文学经典研究中伦理学问题的独特思考, 体现了运用中国文学理论的中国化研究特色。

另有三篇论文创新性地重视三部曲中原本被边缘化的科学问题并予以透辟阐发。其一, 郝田虎连接文学、电影学、科学诸门学科, 阐明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Scientific Prometheanism)先出现在《失乐园》有关知识边界的探讨中, 后突显于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及电影《机械姬》(*Ex Machina*)中的创造类人生物的情节中, 说明弥尔顿与后世文艺创作者都关心科学探索引发的伦理问题, 而且警告人类狂热地追求知识以创造类人生物, 很可能招致灭顶之灾<sup>[36]</sup>。该文巧妙勾连弥尔顿对知识伦理的思考与后人类时代的热议话题——人工智能威胁人类生存, 通过古今作品的参互, 指明诗人倡言节制美德的永恒价值, 示范今日研究应提倡的当代性。其二, 吴玲英和陈则恩通过比较弥尔顿在《失乐园》中的科学观与培根(Francis Bacon)在《新大西岛》(*New Atlantis*)等作品中的科学观, 分析二者就有关科技发展的“大复兴”论之对话, 揭示出诗人谨慎

对待科学的态度<sup>[37]</sup>。较之培根试图以科技进步主导人类文明进程的倡导,弥尔顿对技术发明的细节描写表明他更审慎地认为,人类需以节制等美德约束其科技探索,方可能熔铸有机且完整的社会。这与郝田虎所揭示的弥尔顿倡议以节制美德约束知识探索的观点不谋而合。上述聚焦科学问题的研究拓宽了对《失乐园》中该问题的认识范畴,且具有坚实基础:一是史诗蕴涵诸多科学场景、科学思想、诗人对科学的评论;二是科学在现实语境中的影响不容小觑。十七世纪,新兴科学冲击神学之权威地位;在后工业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带给人类更多挑战,因此学者们对弥尔顿科学观的探析或可为树立现今适用的科学观提供指引。其三,陶久胜另辟蹊径地从医学视角敏锐指出,参孙墮落后的忧郁、参孙父亲和歌队所体现的语言(偶像)崇拜指涉以色列社会的症候,更深层象征英国复辟后的社会病症,暗示弥尔顿的民族焦虑;而参孙的自我救赎表明,“只有通过创伤性忧郁在忏悔中自我救赎,英格兰新教民族才可能重获健康”<sup>[38](129)</sup>。该研究透过个体或部分人的疾病窥视社会整体的状况,可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并且从文本连接现实,直指诗人对英国革命失败的省思,诠释了诗剧中症候的政治、伦理等多维意蕴。

另一脉跨学科研究打通了文学与地理学的藩篱,剖析三部曲中地理叙事的政治与伦理蕴涵。刘立辉首先运用文学地理学中的空间叙事理论,在历史语境与弥尔顿的政治主张之二元坐标中,论述三部曲中庞杂的地理叙事既指涉地理大发现等历史事件,又隐喻诗人鞭挞世俗帝国、向往神圣帝国的志向,此与吴玲英通过辨析弥尔顿指摘“战争英雄”、讴歌“精神英雄”不期而同,揭示了诗人轻视物质享乐、重视美德精神之崇高追求;其次地理叙事围绕英格兰轴心的特点,说明“英格兰想象是弥尔顿三部曲诸多地理叙事的政治推动力”,这一研究从地理学视角证实了陶久胜从医学视角所指出的弥尔顿关注英格兰民族命运的民族使命感;最后结合清教革命背景,指明该革命是“多重空间因素合力的结果”<sup>[29](90,103)</sup>。该研究在前辈评论者较少着眼的三

部曲地理叙事方面挖掘出诗人的政治主张。相比刘立辉研讨三部曲中形形色色的地理空间,刘庆松则聚焦《失乐园》中可谓最核心的地理空间——天堂,厘分诗人依托地理空间所想象的三种天堂共同体模式,即阿卡狄亚<sup>⑩</sup>、乌托邦和共同体,并廓清其政治与伦理寓意<sup>[39]</sup>,揭示想象空间作为“作家审美认识与艺术想象的产物”<sup>[40](39)</sup>,虽无确切实指,却已演化为西方文化里承载美好理想的精神符号。该文对共同体的关注契合国内研究共同体的热点,亦体现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目标<sup>⑪</sup>,堪称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这一中国化研究特色的有效展示。相较于杨莉<sup>[41]</sup>剖析《复乐园》中“内在天堂”的道德内涵,刘庆松更注重挖掘外在天堂的政治意涵。可见,刘立辉与刘庆松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切入,关注弥尔顿的自然观察、书籍阅读与人生阅历如何影响其三部曲的地理性,即“地理因素作为表情达意的主要工具,艺术传达的主要方式”<sup>[42](25)</sup>,并示范性地运用互比参照的研究方法,在比较不同地理空间之过程中探微特定地理空间的意蕴及意义。

就跨文化研究而言,郝田虎从比较文学视角出发,参校弥尔顿与儒家的王权观,创新性地拓展了三部曲研究。该研究比较了弥尔顿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不啻为在外国文学经典研究中比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中国化研究的具体实践。郝田虎指出,弥尔顿和儒家都提倡“美德政治”,两者的思想都属于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相异的是,弥尔顿的主张基于信仰,儒家的观点则建构于“对人的讨论,缺少超验维度”<sup>[43](169)</sup>。此研究难能可贵地避免了将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变成简单的排列式操作,而是循序渐进地参较双方思想,借助文化认知的正迁移,实现了异质文化间的认识与对话。此研究亦启示,为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促进中西文学文化交流互鉴,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需要秉持中华民族主体意识与文化自信,沉潜入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中国学者于此“守正”根基之上,尚需连接中外文学,发掘双方内蕴与价值,采取具有“整体观照”视野<sup>⑫</sup>的跨文化研究方法,于此

过程中创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认知模式和批评话语, 实现“在交流借鉴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学进行本民族话语的自觉言说”<sup>[44](131)</sup>。

可见, 近十年中国大陆学者运用跨学科交叉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方法, 在多元前瞻性理论与庞杂现实场域所织就的经纬中阐发文本, 不仅创造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更彰显了研究的中国特色, 为三部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指引。特别是跨学科方法在把持“学科间性”的基础上, 展开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参互”——交替推挽、相互经纬, 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和学术立场, 从而有效超越文学内部研究, 规避审美批评或道德批评的单一性偏颇, 体现了文学含纳的学科知识之统摄性, 不断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域。尤其针对当代学科分工愈趋细致的现状, 评论者更需注意打破学科壁垒、尽力实现“知识生产的多学科综合性和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性”<sup>[45](71)</sup>。但就中国大陆的弥尔顿三部曲研究而言, 其跨学科探究亟待突破伦理学、科学、地理学问题之范畴。至于跨文化研究方法, 评论者通过钻研中西经典著作在思想层面就具体问题展开的对话, 乃至将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置于人类文化的宏大背景中, 往往能激发外国文学经典阐释之活力、创造新的研究增长点、凸显此类研究在全球化与文化变革浪潮中的用武之地。由此, 外国文学经典研究通过增进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 使其互认互补、和睦共生, 进而推动“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sup>[46](441)</sup>。

### 三、总结与展望

从上述分析可见, 中国大陆近十年的弥尔顿三部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此外, 作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弥尔顿三部曲研究示范了如何使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焕发活力, 特别是在研究趋势和动向上——中国特色较为显著、研究内容多元并蓄、研究方法主动跨界,

而这或能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论指引。我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若秉持中华民族的主体性, 以多元开放的姿态会通异质学科与文化, 将不断焕发研究活力, 凸显外国文学经典实为“容量巨大的文化场域, 各种力量形成的对话与张力使其‘意义’得以不断增殖、演化与传播”<sup>[47](148)</sup>。以下将重点归纳探讨中国大陆近十年的弥尔顿三部曲研究深化和中国化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表现、原因与启迪意义。

就深化和中国化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表现而言, 与西方同侪的文化差异虽使中国大陆评论者理解弥尔顿三部曲时遭遇了前述重重困难, 却亦能反成其优势, 促其做出极具中国特色的研究, 不啻为外国文学经典之中国化研究的范例。其中, 研究内容的中国化主要体现为中国大陆学者联系三部曲中的共同体与中国当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比较研究三部曲与中国典籍; 研究方法的中国化集中表现为中国大陆学者试图运用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学伦理学, 批评探析三部曲中的伦理问题。与中国大陆学者在历史学、文学史、文化批评等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性研究相仿, 这些对弥尔顿三部曲的研究尝试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中国大陆学者的主体性, 或为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提供可行性径向。

关于深化和中国化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原因, 不难看出, 三部曲研究所包孕的中国特色源自批评者的跨文化身份, 正如接受美学中的“身份原则”<sup>[48](114)</sup>和“主体性原则”<sup>[49](740)</sup>都证实读者的身份主导其阐释活动。事实上, 外国文学一旦脱离原语境而进入中国语境, 其意义和价值就同时取决于中国经验, 因为文学作品的意义依靠读者与作品“对话”而生成, 所以“本土经验对外国文学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作用”<sup>[50](138)</sup>。正是基于其跨文化身份与本土经验, 中国大陆学者透过“选择性注意”<sup>[51](42)</sup>与“先见”<sup>[52](270)</sup>的滤镜, 对三部曲的一些解读虽与西方主流研究不太同频, 但不乏合理性, 有效规避了弥尔顿研究因压抑或避免观点冲突而定于一尊、固步自封<sup>[53](36)</sup>。

这些中国特色解读对深化和中国化外国文

学经典研究具有重要启迪意义：中国学者不妨充分发挥“文化自觉”，通过结合或运用上述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对外国文学经典进行中国式观照和解读，力争做出不同于西方学者但自洽的批评。正如学贯中西的钱锺书先生所提出的，学术研究不妨“打通”国别界限，“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sup>[54](3)</sup>。这些在中国化外国文学经典研究方面的努力有望使中国学术走出去——这首先包括中国学者对外国文学原创且独特的理解，其次含纳基于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思维方式与风格气派走出去，这将“不仅传播、阐释中国，也为西方更好理解中国提供方法和策略”<sup>[55](173)</sup>。

除对中国的意义外，走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道路还关涉全人类福祉：正如武寅在《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史研究》中所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史学术体系强有力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是全球史、整体史的最佳研究视角”<sup>[56](1)</sup>。值得借鉴的是，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经典研究亦不妨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构建本领域学术体系的思想理论基础以及研究视角，使此项研究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构建。故研究者需以全球性视野这一更高的站位审视研究对象，挖掘外国文学经典中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的问题，彰显世界文学的整体性。例如，吴玲英与易鸣在审视弥尔顿将史诗传统的武力战争主题改写为人心的善恶之战后强调，在人类的道德发展中，善恶之较量“永远不会结束也永远不容懈怠”，人唯有坚守美德精神力量“方能对抗时刻伺机入侵的邪恶”<sup>[10](170)</sup>。又如，刘庆松在洞悉《失乐园》中共同体范式及其召唤力的基础上，进而倡导建构共同体：“规训的天堂在驱逐了反规训的撒旦之后，呈现出万众一心、有机联结的共同体特质，而地上乐园的始祖同样经历了从乌托邦的丧失到对共同体式天堂的追求。”<sup>[39](292)</sup>

展望未来的弥尔顿三部曲研究，本文认为，中国大陆学者可加强对《复乐园》《斗士参孙》以及将三部曲视为整体的探究；更多、更广泛地

观照以往学者所忽略的话题，如女性人物形象的属性与特质、《复乐园》与《斗士参孙》的风格；融会贯通医学、法学、生态学等学科，创造更多跨学科创新；尤其可以深耕三部曲与中国经典的比较研究，从而揭示中西共通的文心与诗性，进一步中国化外国文学经典批评。其中，参校弥尔顿与中国思想家的观念，不仅对深化并丰富弥尔顿诗歌的内涵大有裨益，也对进一步弘扬中国先贤思想的精髓、揭橥东西方思想的对话与文明的互通互鉴有重要意义。

### 注释：

- ① 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于广州创办英文期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弥尔顿的英文名字出现在该刊1832年11月号中，“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弥尔顿在中国跨文化之旅的起点”(参见：郝田虎，《弥尔顿在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页)。参见：Labors of the missionaries,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32年第7期，第268—273页。其中，弥尔顿的名字见第272—273页。
- ② 这12篇涉及梳理1832—2012年弥尔顿三部曲研究成果的文献包括4部专著、3篇国内期刊论文以及5篇国际权威期刊论文。专著为：吴玲英，《诱惑与英雄：弥尔顿三部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崔梦田，《内在乐园：论弥尔顿晚期诗歌中的认知和自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郝田虎，《弥尔顿在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陈敬玺，《约翰·弥尔顿诗文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国内期刊论文为：刘立壹，《国内弥尔顿研究述评》，《社科纵横》2013年第7期，第135—138页；沈弘，《新中国60年弥尔顿〈失乐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山东外语教学》2013年第6期，第73—78页；郝田虎、崔梦田，《弥尔顿研究代表性文献评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27—39，157页。国际权威期刊论文为：LOH Bei-Yei, Milton in China, *Milton Quarterly* 1992年第2期，第42—45页；SHEN H, A century of Milton studies in China, Review and prospect, *Milton Quarterly* 2014年第2期，第96—109页；HAO T, Milton in Late-Qing China (1837—1911) and the production of cross-cultural knowledge, *Milton Quarterly* 2012年第2期，第86—105页；Hao, Why did Milton land in China earlier than Shakespea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20年第3期，第497—508页；Tianhu Hao, Milton's Satan in China, *Milton*

Studies 2020年第2期,第280—293页。

- ③ 笔者目前未检索到会议论文、新闻报道等其他形式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已检索到的成果中,筛选出所列举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形式。本文于2023年5月18日最后一次检索中国知网、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CSSCI)、中国国家图书馆和Worldcat(世界联合图书馆文献数据库)网站获取相关文献信息。
- ④ 关于中国大陆近十年弥尔顿三部曲研究,目前仅有2013年的相关成果在吴玲英的上述专著中被统计分析(第19—21页);崔梦田的上述专著则对该年部分研究进行非常简短的述评(第29页);吴玲英的上述专著、迪丽努尔的硕士论文在郝田虎的上述专著中被简要述评(第66,197页);吴玲英的这一专著也在郝田虎与崔梦田合著的上述论文中被述评(第34页);2020年7月31日前的相关研究在陈敬玺的上述专著中被统计分析(第27—29页)。
- ⑤ 弥尔顿“无法忍受别人说《复乐园》远不如《失乐园》”。参见:DARBISHIRE H, Milton's Paradise Lo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年版,第75—76页。
- ⑥ 为夏娃违禁的辩护,参见:田汉,《吃了“智果”以后的话》,《少年世界》1920年第1期,第6页;金发荣,《〈失乐园〉中亚当和夏娃堕落的原因》,《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4期,第23页;王雨玉,《理性·情欲·人生——简论弥尔顿长篇史诗〈失乐园〉》,《国外文学》1992年第1期,第63页。
- ⑦ 本文中《失乐园》的引文出自MILTON J, Paradise Lost,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年版。文中用PL表示,以“卷数+行数”的形式标注,诗行的中文翻译参考了朱维之的译本:约翰·弥尔顿,《失乐园》,朱维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 ⑧ 关于“幸运的堕落”论,参见:LOVEJOY A O, Milton and the paradox of the fortunate fall, Journal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1937年第4期,第161—179页;GREEN C C, The paradox of the fall in Paradise Lost, Modern Language Notes 1938年第4期,第557—571页;EMPSON W, Milton's God, Chatto and Windus 1965年版。
- ⑨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见:邵发军,《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第1页。
- ⑩ 古英诗《创世记》创作于八世纪,讲述从上帝创世到亚伯拉罕用儿子以撒献祭上帝的故事,包含《创世记A》(Genesis A)和《创世记B》(Genesis B)两部分。
- ⑪ 弥尔顿的“反三位一体”观:“圣父”至高无上,另有“圣子”“圣灵”两个从属的创造物,三者本质不同。

- ⑫ 弥尔顿掌握拉丁语、意大利语、希腊语等十门外语,参见:HALE J K, Milton's languages: The impact of multilingualism on sty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年版,第8页,以及第105—202页。
- ⑬ 阿卡狄亚(Arcadia):本指古希腊同名地区。该地多山地形和稀少牧民使“阿卡狄亚”一词发展成为一个诗意的代名词,意指未受破坏的原始田园风光。“和谐整一是阿卡狄亚式乐园的特色”(参见:刘庆松,《〈失乐园〉中的天堂模式:从阿卡狄亚、乌托邦到共同体》,《圣经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283页)。
- ⑭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近十年来中国通过与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参见:陈恒、张雁:《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成就与展望》,《光明日报》2023年6月27日,第11版。
- ⑮ “整体观照”是中国诗学的基本方法,强调“以物我合一方式感悟事物整体,获得对事物的生命精神的洞见”。参见:高奋,《论新时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立场、导向和方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83页。

## 参考文献:

- [1] 吴玲英.《复乐园》里的耶稣——基督式英雄之原型[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75-183.
- [2] 王红玫.自由与救赎——《失乐园》中弥尔顿的神学观念[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5.
- [3] 肖明翰.《失乐园》中的自由意志与人的堕落和再生[J].外国文学评论,1999(1):69-76.
- [4] 陈雷.“我把人造得公平正直”——谈《失乐园》中弥尔顿对人类堕落的再现[J].外国文学评论,2017(2):151-166.
- [5] 陈则恩,吴玲英.《失乐园》中的新教伦理之争与资本主义寓言[J].文化与诗学,2021(1):236-252.
- [6] 崔梦田.内在乐园:论弥尔顿晚期诗歌中的认知和自由[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 [7] MILTON J. John Milton prose[M]. David Loewenstein, Ed. Mal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 [8] 李滢波.经典互文与文学想象:《失乐园》对《圣经·创世记》的传承与超越[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84-189.
- [9] 吴玲英.从“诗歌吁求”看弥尔顿对西方史诗传统的继承与发展[J].外国文学评论,2013(4):157-169.
- [10] 吴玲英,易鸣.论《失乐园》对战争的戏仿[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165-171.

- [11] MILTON J. The complete works of John Milton: Volume VIII[M]. J. K. Hale, J. D. Cullington,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12] 陈则恩, 吴玲英. 《失乐园》与《神曲》的同一“三维空间”及“美德线路”[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76-83.
- [13] 陈敬玺. 约翰·弥尔顿诗文研究: 下[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2.
- [14] HILL C. England's turning point: Essays on the 17th century[M]. London: Bookmarks, 1998.
- [15] HANFORD J H, TAAFFE J G. A Milton handbook[M].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70.
- [16] KERRIGAN W. The sacred complex[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7] SMITH A D. National identity[M].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 [18] HAO T. Milton's Satan in China[J]. Milton Studies, 2020(2): 280-293.
- [19] 赵蕾. 论弥尔顿《失乐园》对奥维德诗歌的借鉴之道[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4(3): 101-108, 132.
- [20] 肖明翰. 撒旦式人物: 英国文学一个重要传统之探讨[J]. 外国文学, 2011(5): 49-58, 158.
- [21] 沈弘. 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22] 吴元迈. 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J]. 外国文学研究, 2000(1): 1-13.
- [23] ZHAI K. The fully fledged man in the garden: Milton's Ovidian Adam in Paradise Lost[J].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19(2): 239-257.
- [24] 潘紫霓. 古英诗《创世纪 B》: 《失乐园》的互文本之源[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2(2): 130-142.
- [25] 谭茹方. 混沌与开窍: 论弥尔顿对参孙形象的再创造[J]. 圣经文学研究, 2022(1): 302-324.
- [26] 吴玲英. 从“循道英雄”到“殉道英雄”——论弥尔顿三部曲中的“英雄”[J]. 国外文学, 2016(1): 134-142, 160.
- [27] KRISTEVA J. Word, dialogue and novel[C]// Toril Moi. The Kristeva reader. Mal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86.
- [28] QUINT D. Inside Paradise Lost: Reading the designs of Milton's epic[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9] 刘立辉. 变动与天道: 弥尔顿《失乐园》的巴洛克世界[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127-136.
- [30] BROADBENT J B. Some graver subjects: An essay on Paradise Lost[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0.
- [31] 易鸣, 吴玲英. 论《失乐园》里的撒旦式雄辩与文艺复兴疑辩传统[J]. 外国语言与文化, 2022(2): 41-49.
- [32] 陈敬玺. 古朴典雅的洪钟巨吕——论弥尔顿的“庄严体”[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137-141.
- [33] MILTON J, PATTERSON F A. The works of John Milton: Volume I[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 [34] 费孝通. 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6.
- [35] 罗诗旻.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下的《失乐园》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6.
- [36] HAO T H. Scientific Prometheanism and the boundaries of knowledge: Whither goes AI?[J]. European Review, 2018(2): 330-343.
- [37] 吴玲英, 陈则恩. 《失乐园》技术发明情节描写中的科技发展观“对话”[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188-196.
- [38] 陶久胜. 英国复辟时期的新教民族身份焦虑——《力士参孙》中的疯癫、复仇与反偶像崇拜[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2): 129-137, 161.
- [39] 刘庆松. 《失乐园》中的天堂模式: 从阿卡狄亚、乌托邦到共同体[J]. 圣经文学研究, 2022(1): 279-301.
- [40] 邹建军, 周亚芬. 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2): 35-43.
- [41] 杨莉. 《天路历程》和《复乐园》中的天堂书写[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21-26.
- [42] 颜红菲. 薇拉·凯瑟长篇小说地理叙事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 [43] HAO T H. John Milton's idea of kingship and its comparison with Confucianism[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17(1): 161-176.
- [44] 刘建军. 刘建军: 关于“世界文学”等问题的反思[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8(1): 130-135.
- [45] 蒋承勇. 跨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创新[J]. 外国文学研究, 2020(3): 61-72.
- [4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47] 傅守祥, 魏丽娜. 诗性正义与活用经典——兼论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立场、方法及路径[J]. 浙江社会科学, 2016(1): 145-150, 161.
- [48] LICHTENSTEIN H. The dilemma of human identity[M].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77.
- [49] BLEICH D. The subjective character of critical interpretation[J]. College English, 1975(7): 739-755.
- [50] 高玉. 本土经验与外国文学接受[J]. 外国文学研究, 2008(4): 130-139.

- [51] ROSENBLATT L M. *The reader, the text, the poem: The transactional theory of the literary work*[M].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4.
- [52] GADAMER H G. *Truth and method*[M]. Joel Weinsheimer, Donald G. Marshall, Trans. New York: Crossword, 1989.
- [53] WITTREICH J A. "He ever was a dissenter": Milton's transgressive maneuvers in *Paradise Lost*[C]// Kristin P. McColgan, Charles W. Durham. *Arenas of conflict: Milton and the unfettered mind*. Selinsgrove: Susquehan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54] 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55] 白雪花. 守正、融通与创新: 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学术走出去[J]. *当代外国文学*, 2023(1): 171-173.
- [56] 武寅. 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史研究[J]. *世界历史*, 2019(6): 1-2.

## An exemplar of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review of Milton's trilogy studie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WU Lingying, LI Weixu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Since Milton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1832, the number of research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on Milton's trilogy by scholars from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s exceeded one hundred, with a soaring increase in the last decade (2013—2022) in particular. First, the research content has been extended in depth,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 Milton's theological, ethical, and political ideas in the themes; the Devil and the Heroes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Renaissance cultural field on the style. Second,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has been innovated, represented by the employ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methods. This article, by taking Milton studies as an exemplar of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y pointing out the immense space for development, hopes to show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Milton studie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to provide certain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studie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Key Words:** John Milton; Milton's trilogy; an exemplar of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land of China; community

[编辑: 陈一奔]